

缅怀经济史研究组老一辈学者

----庆祝经济所建所九十周年

江太新

当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迎来建所九十周年之际，我对老一辈学者表示深深敬意和怀念！是他们为经济所辉煌奠基，是他们为经济所辉煌贡献毕生才华。他们是经济所的精英，为创建了具有中国经济特色的经济理论做出贡献；他们是经济所辛勤的园丁，为国家培育了大量高水平经济学人才。他们值得我们缅怀，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下面，我仅就经济史研究组的老一辈学者，对经济所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作些回忆，以资缅怀！

一、经济史研究组老一辈学者的来龙去脉（指解放前至1953年中国科学院经济所成立这段时间的老学者）。

经济史研究组的老一辈学者，大都是从民国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转来的，也有个别的是解放初调进来的。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到台湾时，是年四五月间，一再下令中央研究院搬迁台湾，有的所奉令迁台，社会研究所拒绝搬迁台湾，决定留下来迎接新中国来临。在研究所搬与不搬的过程中，李文治先生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不少作用。1949年全国解放后，社会所由中国科学院接收，并从南京迁到北京中关村，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1953年在社会所的基础上，成立经济研究所。该所成立之初设两个研究组，其中一个就是经济史研究组。该组成员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原有班子为主及解放后新进人员组成，他们是：严中平、李文治、汪敬虞、章有义、彭泽益、姚贤镐、聂宝璋、张国辉、宓汝成、魏金玉、许钧、彭家礼、郭瑾仪等。组长由严中平副所长兼任。这些都是最早来到经济史研究组的老人。除郭瑾仪于1970年在息县东岳“五七”干校去世，许钧、姚贤镐于1982年在北京去世外，其余老先生是1987年实行退休制度后，相继先后退休了。严公因先后任全国政协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至1990年去世前，都在职。汪公由1983至1993年任职两届政协委员后，于1993年退休。但这些老学者退而不休，还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直到仙逝。

二、为经济史研究组多出和快出人才，建立一整套人才培养制度。

解放初期，经济所接到国务院写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科书的任务，这任务落在经济史研究组头上，但经济史研究组人手不足，从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班借调一批人，他们有孙健、王方中、陈振中、赵德馨等。后来，他们随着工作分配，陆续走向新工作单位，孙健、王方中、陈振中回人大经济系，赵德馨分配到中南财经大学。人员变动给经济史研究组造成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对借调人员不稳定性有更加深刻认识。以严中平先生为首的老一辈学者，为经济史研究组长远发展着想，着手考虑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们深刻感受到人才是立组之本，是逼在眼前大事。于是，开始陆续从各大学招进毕业生。陆续引进人员的目的，在于保证研究组人员的配备，与含接问题；另一方面对进来的人员进行再培养。大学毕业生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只是一些基础知识，与专业研究工作还不搭边，要使这些招进来的人尽快熟悉本行工作，还得再培养。严先生他们为进组人员制订了一套培养办法：一是让进组人员，到图书馆实习一年。为什么要让进组人员到图书馆实习？经济史研究特点是与图书打交道，熟悉馆藏就成一件大事，知道你要的书放在那里，借书就很方便了，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节省大量时间。二是给进来人员指派老师，用师傅带徒弟办法，使进来的学生尽快向研究型人员转化。老师的作用是指点，而不是包办代替，使刚进门的学生少走弯路，放手让他们去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帮助解决遇到的问题，给以渔，而不是给予鱼。同时在老师指导下，还可以学习到老师治学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以及高尚的情操。如经君健先生1954年到组后，就先给李文治先生当了一年助手，而后又跟随严中平先生工作多年。1964年，江泰新、陈树平到组后，严中平先生指派李文治先生为我俩的导师，吴慧敏导师是章有义先生。1967

年，刘克祥进组后，指导老师是章有义先生。这种指导老师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三是招收研究生。1963年，经济研究所开办研究生制度，王本伟为严中平先生的第一个开门子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展，这项工作被打断，直至1987年才得以恢复。由于实行这种人才培养制度，使经济史研究组人员结构成形阶梯型模式，使经济史研究组发展充满生机。指导老师培养制度的实施，的确为经济史研究组的研究人员成长做出贡献，这些人后来都成经济史研究组(室)的骨干力量。吃水不忘挖井人，知恩不报非君子，在这里，我要向为培养后学而付出辛勤劳动和智慧的园丁，致以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礼。

三、严谨治学的典范。

以严中平先生为首的老一辈学者，为写出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他们极其重视资料搜集工作。他们从默默无闻资料工作做起：李文治、章有义两位先生负责编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汪敬虞先生负责编写《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先生负责编写《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姚贤镐先生负责编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聂宝璋先生负责编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宓汝成负责编写《中国铁路史资料》。在编写资料基础上，严中平先生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在编写资料工作同时，一些先生先进行专题研究工作，如：张国辉先生在探讨《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和《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宓汝成先生进行《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探讨等。有这些丰厚资料打底，才有厚重的著作面世。

严中平先生在回忆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一书时说：“我们那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定稿付印以后，经过我们校对过三次清样，每校一次都有一次修改，到了全书印成以后又追加一份很长的勘误表。”¹从这里可以见到，这些老先生对研究工作的严谨，认真态度。严公谆谆教导我们说：“收集资料，又是一项细致的工作。阅读文献，要深入考察，不可走马看花，致有遗漏；抄录资料，要意义完整，不可断章取义；还要认真校对，以免发生错字漏字；加工统计资料，尤其需要考虑周到，仔细计算，最好由两个人计算同一资料，彼此互校。”²严公这些意味深长的话，值得我们记取。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对待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严谨学风，也值得我们记取。1969年，经济所接到搬迁河南息县东岳“五七”干校后，组织人员清理各组办公室留下的文件。我在清理经济史组文件柜时，发现《中国近代经济史》写作提纲讨论稿，就有四份之多(是否还有更多提纲，我不清楚)。这些老师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整理资料过程中，把自己的心得不断充实到写作纲要里。写作提纲不断被修订，说明他们写作态度十分认真，严谨，以及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好，五七干校期间也好，这些老师从来没有停止对自己承担课题的思考，宓汝成先生还说，我的腹稿都打了几遍了。所以，恢复正常业务工作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一卷写作，很快就上马。严中平、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成就，是建立在丰硕资料上，和勇于创新精神相合的结晶。

四、重视资料库建设。

经济史研究组的辉煌与老一辈学者重视资料库的建设分不开的。资料和研究工作是互相依存的一对孪生兄弟，谁也离不开谁。好像人离开水和氧气一样，离开了就活不下去。缺乏资料为依据的文章，也就等于废品。资料库的建设，成为老一辈学者极为关注的事。经济研究所图书馆馆藏有许多资料不是买来的，如《户部题本》、《清代粮价》、《万历会计录》、《自然灾害与农业收成资料》等。但这些资料是怎么来的，可能知道者不多。这些资料是汤象龙、彭泽益等老一辈学者花了大量心血，组织人员从明清档案馆抄回来的。还有一部分《屯溪资

¹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²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料》，是解放初期从安徽屯溪古旧书店买来的。土地改革时，安徽徽州地区清理出大量账本、地契、分家书、租佃契约等大批资料。严公派魏金玉先生到屯溪故旧书店去寻宝。魏公不负众望，在他精心挑选下，一批精品汇集到经济所图书馆。现存经济史研究室的《屯溪资料》就是这样来的。这批资料的收藏，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农业部分纂写提供了丰富养份。1976年，经济研究所刚恢复正常工作，在研究所经费十分困难情况下，为搜集《清代获鹿资料》，严公亲自出面，向所里申请到一笔经费，使这项工作得以完成。这份资料为研究清代地权分配提供了一个窗口。经君健先生继承老一辈学者重视资料库建设精神，组织人力完成《明实录》剪裁和分类工作，给明史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另外，还有一部日本档案，这是日本人失败后，留下的垃圾。经济研究所得悉这批垃圾要处理时，派人去搜集回来，并花大量人力去整理，现在成为研究日本侵华的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些都是他们的建树。我们今天能坐在单位里阅读这些珍贵资料，是属于前人种树，后人遮荫。应感谢老一辈学者所付出的心血。吃水要不忘挖井人。

五、丰硕的成果。

这些老一辈学者，不论在职期间，或是退休后，他们还是手不离书，手不离笔，孜孜不倦耕耘在课题中，为经济研究所辉煌贡献毕生力量和终身才华。下面，把他们主要著作(不包括论文。由于论文数量太多，这里没有收入，若要查询，可参见他们的《文集》。特此申明。)成果列于后：

严中平：

- 1、《中国棉业之发展(1289--1937)----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之个案析》，商务印书馆，1943年出版；
- 2、《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
- 3、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合著)，科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
- 4、译著《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合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 5、《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上海棉纺织工人状况》(合著)，柏林德文本，1964年出版；
- 6《老殖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
- 7《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 8、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合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 9、《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李文治：

- 1、《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7年出版；
- 2、《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1840—1894》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 3、《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合著)，科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
- 4、《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 5、《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合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 6、《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7、《清代漕运》(合著)，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
- 8、《李文治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9、《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 10、《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汪敬虞：

- 1、《中国国民所得》(合著)，中华书局，1947年出版；

- 2、《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合著), 科学出版社, 1955 年出版;
- 3、译著《雅可夫柴夫斯基》(合著), 科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 4、《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下两卷, 第二辑上、下两卷, 科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 5、译著《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合著),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 6、《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 7、《唐廷枢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 8、《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 9、《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合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 10、《中国通史》第 10 册(合著),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 11、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合著),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 12、《汪敬虞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 1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章有义:

- 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三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出版;
- 2、《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 3、《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 4、《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 5、《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合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彭泽益:

- 1、《太平天国革命思潮》,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6 年出版;
- 2、《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一、二、三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出版;
- 3、《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 4、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 5、《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下册, 中华书局, 1995 年出版。

姚贤镐:

- 1、《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1840—1895》, 中华书局, 1962 年出版。

张国辉:

- 1、《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 2、《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 中华书局, 1989 年出版;
- 3、《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合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 4、《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合著),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 5、《张国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 6、《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聂宝璋:

- 1、《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合著), 科学出版社, 1955 年出版;
- 2、《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 3、《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下两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 4、《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合编)上、下两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 5、《聂宝璋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宓汝成:

- 1、《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40—1911)》一、二、三、四卷，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
- 2、《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 3、《中国近代外债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 4、《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彭家礼：

- 1、《英属马来亚的开发》，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

魏金玉：

- 1、《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 2、与方行、经君健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史清代经济卷》上、中、下三卷(合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

以上这些老学者的著作甚多，由于限于手头资料不足，可能有遗漏，请大家见谅。

这些老一辈学者不但著作等身，而且著作质量极高，他们的著作不仅仅成为同行案头必备参考书，而且对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对社会也产生积极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出版后，即被奉为爱国主义教科书，是顶尖著作。许多著作都占据国内或国外最前沿地位。请看这些著作获奖情况：

1、《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合著，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成果奖。

2、《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合著，严中平主编，1991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成果奖。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成果奖；1997年获第三届吴玉章奖金特等奖；1999年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专著类)壹等奖；1999年获郭沫若历史科学贰等奖。

3、《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宓汝成著，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成果奖；

4、《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成果奖。

5、《明清时代土地关系的松解》，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成果奖。

6、《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成果奖。

7、《清代漕运》获199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7年获第三届吴玉章奖金(历史类)壹等奖；1999年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专著类)贰等奖；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成果追加奖。

六、关怀备至，高尚情操

我们在经济所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培养与关怀。虽说人才成长，须靠年青学者自己辛勤努力，但离开名师指导。

一个刚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分配到经济史组工作，要从何处做起、从何处下手，脑袋一片空白，如一叶小舟漂泊在大海，感到很茫然。这时，名师就是一个灯塔，他可以根据组(室)工作需要，作好长远规划，并结合你的情况，为你量身打造，指明你今后的努力方向。我和陈树平、吴慧敏三人分别是从小学和南开大学历史系专业毕业后，被选拔到经济所经济史组工作的，但到研究组后要做什么，却心中无数，也不知今后要从何处努力，心情自然十分焦虑。好在到所里不久后，严中平先生即刻为我们指派老师，吴慧敏的指导老师是章有义先生，我和树平的指导老师是李文治先生。根据李公长期摸索，认为明清生产力问题及明清土地问题都是当时学术界薄弱环节，尤其是生产力研究被忽视，从事研究者不多，大有伸展手脚的余地；而土地问题，研究者虽然较多，但多偏向于制度研究和地权集中问题探讨，还有许多问题还是空白，就是土地制度本身问题，也有待深入探讨，开拓空间还很大。这两个大问题做好了，都能出成绩，为经济史研究做贡献。人们都说，找到问题了，是研究工作成功的开始。对问题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体现导师深邃智慧及长远目光，也体现了导师

对学生深切期望。但一般入门者很难窥视到这一点。这是导师特有的作用。我感谢严先生为我指派这么卓越的导师，我感谢为我量身而制定课题的李先生，他使我终身受益。

我的第一篇习作是《清代前期押租制的发展》。开始创作是在1978年。当时，我把想法告诉李公，李公听完我的想法之后，鼓励我按照思想先写个初稿。经过几个月努力，我把初稿送给李公审查。尽管李公正为《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写作而忙碌，但是他还是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为我审稿。他看稿很仔细，凡有错字、别字都给改过来，对提法不妥之处，给打个问号，让你自己去考虑，不包办，不代替。对需要改写问题，只提出建议，让你自己动手。比如写押租发展原因时，原稿从商品经济发展角度去探讨，李公指出，这种认识太一般化，而且已有人从这方面论述过这问题，你再说一遍，没有意义。虽然你资料多些，但问题性质没有改，并没有超出人家窝巢。你应从租佃关系中去探索，发现新问题，走出一条新路子来。这么一改，原来三千多字稿子，最后只剩下十几个字放在开篇中叙述。虽然，这一改动花去了我一个多月时间，然而文章的品味却提升一大步。出版后，同行给予好评，但不知李公为该文所花的心血有多少。本文获得成功，这是导师引导之功。李公不但为我看稿，而且还建议我该写些什么文章。他说，过去人们都认为清代地权占有高度集中，你能不能去摸索一下，看看到底怎么样。在李公指导下，我开始就清初地权分配进行探讨。在清初垦荒政策指导下，许多原来无地或少地农民，通过垦荒都获得土地产权，这时百份之八九十的土地为农民所占有。我把摸索到的情况，向李公汇报。李公认为这种情况比较符合当时实际。于是，他鼓励我把这问题写出来。这篇《清初垦荒政策及地权分配情况的考察》一文，于1982年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这篇在清代地权分配研究中独树一帜的文章，是在李公策划下出笼的。李公奖掖后学的精神和崇高品德，在我脑海中牢固树立着。

在写清代押租这篇文章过程中，还有一个插曲让我十分感动。1979年春节，我到三里二区给几位老先生拜年，见到汪敬虞先生时，他问起我最近搞什么课题呀？我说：正是写清代押租制的发展。他听说我写清代押租时，沉思了一会，接着说，我过去搞资料时，曾收搜到一些有关东北地区的押租资料，待我找到时，给你。我当初以为，他只有说说而已。怎么也没想到他能花那么多时间，为这些资料翻箱倒柜。过没几天，汪公便把那些资料给了我。一般人都把自己手头上的资料看成宝贝，都不轻易示人，更何况直接送人！汪公这一举动，使我十分感动。一是汪公助人为乐高尚情操，以及一言九鼎，说出的话必须做到的诚信传统美德，令人钦佩，二是，这些资料我手头上还是个空白，正好补缺，充实了文章内容。面对着老前辈学者的关怀，怎能不令我感动！

另外，汪公对我个人成长也十分关怀。时任研究室副主任的他，对研究室年青人职称问题十分关注。1986年春节，我到三里河二区给几位老师拜年。汪公见到我后，他以好奇的口吻问我：这次评职称(指1985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的申请书呀？根据你这几年的成果看，评上副研根本没有问题。我说，不是我没申请，而是后来放弃了。他问，怎么回事？于是，我把当时任副所长林青松对我说的话告诉他。林青松对我说，由于过去职称评审工作不正常，很多老人职称评审问题都积压下来，现在所里有的老同志，面临六十岁了，若今年没评上职称，就永远失去评职称的机会了。他们在经济所搞了一辈子研究工作，到头来，连一个副研职称都没评上，对他们打击太大了。你还年青，还有很多机会，今年是否就不参加评审了。我说，考虑到所里的难处，也考虑老同志心情，于是，我就同意所里的安排了，退出这次评审了。汪公听了我的话后，他噢了一声，接着说原来是这样。你做得很不错。因为职称是与工资收入挂勾、与学术地位挂勾，因此，有的单位为职称评审闹得不可开交。你这种谦让精神很值得钦佩！汪公一席话，闹得我很不好意思。我说，当时只想我还年轻，机会还多，而老同志失去这个机会的话，却永远没有这个机会弥补了，其他的也没多想。我接着说：您才是最值得尊敬人！把研究室里年轻同志的事都装在心里，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

严公、严公，对人很严！这可能是误解。他对年青人的关爱，对年青人的成长，却实实

在在的。1982年，我们陪同严公到医院看病，在返程车上，严公回过头来对我说，小江，听李公说，你最近投《历史研究》的文章要你压缩到2万字左右，是吗？你能不能把文章给我看看。我回答说：好，回头给您送去。严公看完文章后，说了一句话：“削脚适履”。这么小的小事，他都放在心上，足见严公对后学的关爱。1985年前后，经济研究所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编辑工作。纂写经济史条目任务，就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我负责庄田等六个条目写作。《庄田》条目初稿写好后，严公在审查过程中，在稿子空白处提出了十三个问题。引导你去思考、去钻研。1988年刊登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的庄田条目，就饱含严公指导的心血。

我到经济史研究(组)室后，除了感受到老师的关爱外，还深深感受到老师的人格魅力。我有几篇习作是在李公指导下完成的。投稿前，我征求李公意见，我说：这稿子是在您的指导下完成的，应该署名你我合作。李公听说后，连忙摆手说：“这可不成。文章是你写的，文章要旨是你定的，资料是你搜集的，我只不过出点点子而已。我不能占你的劳动成果。”在现实生活中，学生写稿，老师挂名的情况累见不鲜，而在李公这里却成禁忌。相比之下，这种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这种精神境界，是何等的高贵呀！

1984年，章有义先生的《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一书出版了，我经过认真学习之后，感受很深，萌生了写篇读后感的想法。事后，我付之于行动，写了篇“探索明清土地关系的新窗口”一文。投稿之前，我将稿子请章公审阅。章公看后，批文称：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但什么“填补空白”、“开山之作”之类的话，我承受不了。文中有关这类拔高之词，我已删去。是不是“填补空白”让大家去评议。见到章公批语，我十分感动。章公虚怀若谷的高尚品格，令我久久难以忘怀。该文修订后，1986年在《经济研究》第9期上发表。

以上所写，仅仅老一辈学者一些事例而已，无法展现老一辈学者的全部精神风貌，但仅从这些侧面，已足够反映他们卓越成就和高尚情操。

我写此文的目的，一是缅怀，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后来者要学习他们严谨治学、勇于攀登的精神，同时学习他们以助人为乐，只讲贡献，不求索取，以及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崇高品德。

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的老一辈学者，我们怀念你们！